

全球化—区域化下的东亚学与中国学

李长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日益猛烈，冲击着以往的国家畛域和地缘观念，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作为地缘国家联合的区域化趋势日益强化，特别是区域经济共同体组织迅速发展。欧共体、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南亚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区域组织，在谋求区域合作与共同利益方面积极展开活动。大国之间的竞争已日益转化为区域组织之间的竞争，这对东亚地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东亚地区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持续增长，使冷战时期形成的旧格局被打破，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相互已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贸易伙伴，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日渐增强。然而，东亚三国的相互关系却颇为曲折起伏，中日关系近来更降至低点，出现经热政冷的局面。影响相互关系的症结就在于历史认识问题，这种历史认识与民族感情及现实利益关系纠结在一起，形成矛盾的焦点，而且随着东亚三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及国策的调整，相互间经济联系、人员交往的增强，以及人民年龄世代的自然更替，这种矛盾表现得愈益突出和尖锐。显然，东亚三国人民不对纵向的历史认识问题达成相互的理解与基本的共识，就无法展开横向的真诚合作，无法建立起基本的信任从而谋求共同利益，而且将给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埋下隐患。区域化使东亚人民的生存环境及未来命运连为一体，我们需要发掘我们的历史经验与智慧，来寻求今天及未来的相处共生之道。对此，东亚的历史学者作为历史知识资源和经验智慧的主要传承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迄今历史学者的回应却极为无力，各国大多数历史学者仍然沿袭着20世纪国民国家的单一思路在各说各话，

对东亚区域化的变动反应迟缓，使得各国人民的历史认识彼此隔绝，缺乏了解，更谈不到相互的理解与基本共识。这种状况亟需改变，我们必须面对并有责任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知识共有，相互理解，谋求共识。这就需要调整思路，另辟路径，超越以往国别史学术藩篱及单一民族立场，开辟“东亚学”的新领域，从东亚整体视角来观照东亚共同的问题及东亚内部的各国问题。东亚视角之下的中国学，是“东亚学”的重要一翼，也需要作出新的开拓。这个“东亚学”的新领域，需要我们首先回答以下一些课题：

一、“东亚意识”的历史梳理

所谓“东亚意识”，即依某种秩序原理而建构的东亚关系与整体秩序观。区域化带来东亚意识的高涨，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提倡构建“东亚共同体”。2003年12月，日本在与东盟首脑会议上以《东京宣言》的形式明确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这里所指的“东亚共同体”不只是中、日、韩，也包括东盟10国）。小泉首相又在2004年的联大演说及2005年初的众议院施政演说中提出这一方针。2005年8月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提出了长篇政策建议报告《东亚共同体构想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作为日本推行这一国策的理论论证。但对此东亚各国有不同的反应及复杂的品味。由于近代以来东亚中、日、韩三国关系日益密切，形成了各自对东亚秩序及紧密关系的不同构想和历史感受，所以，虽然日本的这一构想主要是从现实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各国人们又总是禁不住或

多或少地生发出某种历史的联想，从他国的立场而从中感到某种不同的历史意味。如以往导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前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等。也就是说，当今东亚新秩序的建构有两个前提：第一，它不只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有着不可回避、不可摆脱的历史连带意蕴；第二，它不只是一个国家凭借自己的意志就可以单独建构的，而是要在各国平等沟通、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建构，要能够包容各国人民的历史认知、文化传统、意志愿望和民族利益，体现东亚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都充塞着历史丝蔓的缠绕，需要作出清理。没有这种历史的清理，所谓东亚一体化或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框架就没有建立的基础。因而需要对于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东亚意识的流变作出历史梳理。如对于给东亚带来战争灾难的日本近代的东亚意识要作出历史的清算，达成共识，方能以此为建构新东亚秩序的起点。再如日本和韩国学者都曾批评中国人缺乏“亚洲意识”和东亚连带感，对此我曾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地缘关系的多边性；二是近代以来中国受列强环伺纷争，因而争取民族独立需直面世界的生存环境。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直面世界的性格，而单一向度的东亚连带意识不象日本和韩国那样强烈¹⁾。但是，正由于中国人东亚意识的淡薄，使东亚问题长期被忽略，对东亚他国的内部变化缺乏了解，以致积聚了隔阂。

历史学者应当以充分的历史知识清晰地告知人们：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东亚意识和东亚构想是怎样形成的？有何差异？各自基于怎样的秩序理念？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并进而由以往的历史经验而提出，今天共同构建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应当基于怎样的理念？如何消解彼此的隔膜而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基本共识而形成共同的东亚意识？

二、东亚整体史及东亚视角下的中国史

东亚区域一体化需要我们建构东亚整体史，即超越以往国别为单位的历史叙述而建构以东亚整体

为视角的东亚整体的历史记述与认知。近年一些日本、韩国的历史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探索，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但相对来说这方面的思考比较迟缓。建构东亚整体史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从研究对象上，超越以往国别史彼此隔断的国家疆域，而以东亚为一个相互联系、彼此互动的历史整体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作的海洋亚洲及东亚贸易圈研究作出了创新性的尝试²⁾。他们的研究从15世纪以来亚洲及东亚经济贸易联系的考察，探索前近代形成的亚洲及东亚的内部秩序，描述了一幅非西方中心而以亚洲整体为中心的亚洲地域史新景观。

二是从研究意识和视角上，超越以往的民族国家意识，而立足于东亚全体及普遍人类价值理念，以此为新的视角来观照东亚及东亚之中的各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创造中日“知识共同体”³⁾，是这一视角的开创性探索。韩国学者白永瑞也提出以“知性实验的东亚”概念，建构东亚整体史的学术体系，并将此一视角的转换视为东亚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史学革命”。我们对此从中国与韩国不同的视角作过讨论⁴⁾。这方面的探索需要把握好学者本国的主体性与东亚整体性之间的协调关系。

三是从研究方法上，超越以往各国彼此独立、相互封闭、各说各话的学术路径，更多地以跨国合作的方式以展示多面的认识视角。这种探索，今年5-6月间在中、日、韩三国同时出版的由三国50余位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一个范例。该书主旨，即其封面上所写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⁵⁾。虽然这部书只是一本面向青年学生的普及性历史读本，但却是三国学者共同撰写东亚整体史的一个新的尝试，是学术方法上的一个创举。至于东亚整体中的中国史，也应调整视角，超越以往的囿于中国内部的自我内视，从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中，从东亚他国的比较中，从东亚整体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应当增强以各国学者共同研究一个问题的跨国合作研究的方式，来展示对中国某一历史问题研究的多视角与多面性。

三、对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

战争认识的差别问题是影响今天东亚国际关系的关键，对此各国的历史学者应当有所作为。近来中国及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学者提出建立东亚“共同历史认识”问题，并指出应从史实的共有和多面的视角做起，这可以说是解决战争认识差别问题的基础性开拓之见⁶⁾。展开来说，需要做的应有以下几项：第一是以客观记述战争史实为建立共同认识的基础。即排除掺杂意识形态、狭隘的民族感情、政治意图、现实利益等附加的杂质，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和割裂，还原历史事实的原貌，以作为历史认识的底线知识。第二，在以往由国家立场各说各话的国别战争史记述之外，还要有从各国不同视角下记述不同面相的全景战争史，并分别对各国人们的历史事实经历、历史感受、历史记忆及历史认知作出对比性研究。第三，不只是停留在对于战争本身的记述，还要对战争的内在原因及长远影响进行探究。对战争认识的差异，实则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以战争问题为核心表现出来的历史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利益、文化传统、世界观、价值观、认知心理、思维方式等种种差异凝结的历史文化问题。需要对于这些因素及其与战争认识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揭示和梳理，以使各国人民能够加强彼此的了解与理解，从而为达成共同的战争历史认识提供知识资源和认识基础。

四、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自我认识与相互认识

各国历史认识的差异，也表现在近代以来各国的自我认知与他国认识之间的差异。以往各国的历史，都是本国的历史学者从建构本土历史文化认同的立场出发，以本土视角对自身历史的构画。如果以东亚视角来重新观察的话，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因为近代以来东亚关系的密切，使他国对于该国的认识也成为影响该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对他国的认识是外交政策的基础。拿对中国的认

识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自我认识不断变化，由早期基于华夷观念的自我中心、盲目自大，到后来的自我否定、民族虚无，直至奋斗与崛起，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深受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也与东亚关系密切相关。因而需要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自我认识、中国的日本观及东亚观，日本和韩国的中国认识，以及中国自我认识与他国认识差异的比较等问题，以厘清自我认识与他国认识的差异及其后果。以往虽然也有各国历史的交插研究，日本和韩国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认识问题已经作出了一些成果⁷⁾，但尚缺乏向中国系统地引介及与中国学者展开对话。应当建立起这样一种交插研究的学术空间，以使中国历史在多面镜子的观照下呈现出立体的影象。

五、各国近代理念与“东亚伦理”的探讨

东亚各国历史认识的差异，最根本的在于核心理念的差异。各国在近代以来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基于文化传统和近代化道路而形成了各自的近代理念，这种理念是指导各国制定国策及对外方针的基础。但是以往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特别是对于东亚各国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理念，这些理念的本土社会文化底蕴，以及各国近代理念的差异和互通等缺乏对比的研究。以致至今不少人仍然陷于简单化的东西方价值二元对立、以抽象概念代替复杂现实的冷战思维。关于从世界和东亚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近代理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作出了杰出的研究。他将中国近代理念与西方和日本作了比较，摒弃了向来沿袭的欧洲标准，指出中国具有源自于内部的独自的近代理念，即“调和共存”原理，这种理念起于前近代，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的变革，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理念不同于欧洲，但却引导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堪称是世界多元现代性的一个非西方的代表⁸⁾。特别是他提出的将欧洲标准相对化，多元现代性，近代理念的探索应当回归东亚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意义⁹⁾。但是，这样的研究还是太少，特别

是对东亚各国近代理念的演变与比较，各国理念与普遍理念的关系，以及对于东亚历史的影响，还有待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课题，是所谓“东亚伦理”问题。这一问题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经提起，源自于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反省。但这些回应式的反省，主要是围绕元问题所指向的经济伦理范畴，而且其内在的标准仍然是韦伯所指称的西方标准。实则从现今的东亚实际需要出发，“东亚伦理”作为引导东亚各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系统，我们的探究除了经济伦理的领域之外，至少还应当扩展到社会伦理和国际关系伦理两个领域。因为这两个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东亚各国的相处之道，我们需要在探究东亚各国不同的伦理基础上，相互理解与沟通，建构东亚彼此信任、共同发展、和平相处的底线伦理。

以上诸方面都是在区域化对东亚的挑战之下，我们东亚及中国学的学者今天所面对的时代新课题，需要我们从历史学者的学术良知出发，以理性与科学为原则，以东亚人民的共同利益为立足点，拿出责任感和勇气去面对和解答。东亚的命运有待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东亚的命运有待于东亚的历史学者负起时代的责任。

注释

- 1) 参看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载《读书》2005年第4期。
- 2) 参看滨下武志编：《東アジア世界の地域ネットワーク》，日本山川出版社1999年；尾本惠市、滨下武志、村井吉敬、家岛彦一主编：《海のアジア》6卷，日本岩波书店2000年11月-2001年；李长莉：《海洋亚洲：网络化的地域史》，载《读书》2002年第7期。
- 3) 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载《读书》2001年第5期。
- 4) 参看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载《读书》2005年第4期；白永瑞主编：《作为发见的东亚细亚》，（韩国）文学与知性社2000年出版；白永瑞著：《回归东亚：探索中国的近代性》，（韩国）创作与批评社2000年出版；白永瑞主编：《从周边看东亚细亚》，（韩国）文学与知性社2004年出版。
- 5) 该书在中、日、韩三国同时出版，中文版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6) 《需要调整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就〈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22日。
- 7) 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韩国学者裴京汉的《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本）等。
- 8)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李长莉：《中国哲学的二十一世纪原理——沟口雄三教授访谈录》，载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第6期。李长莉：《揭示多元世界中的中国原理——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 9) 沟口雄三：《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载《读书》2005年第4期。